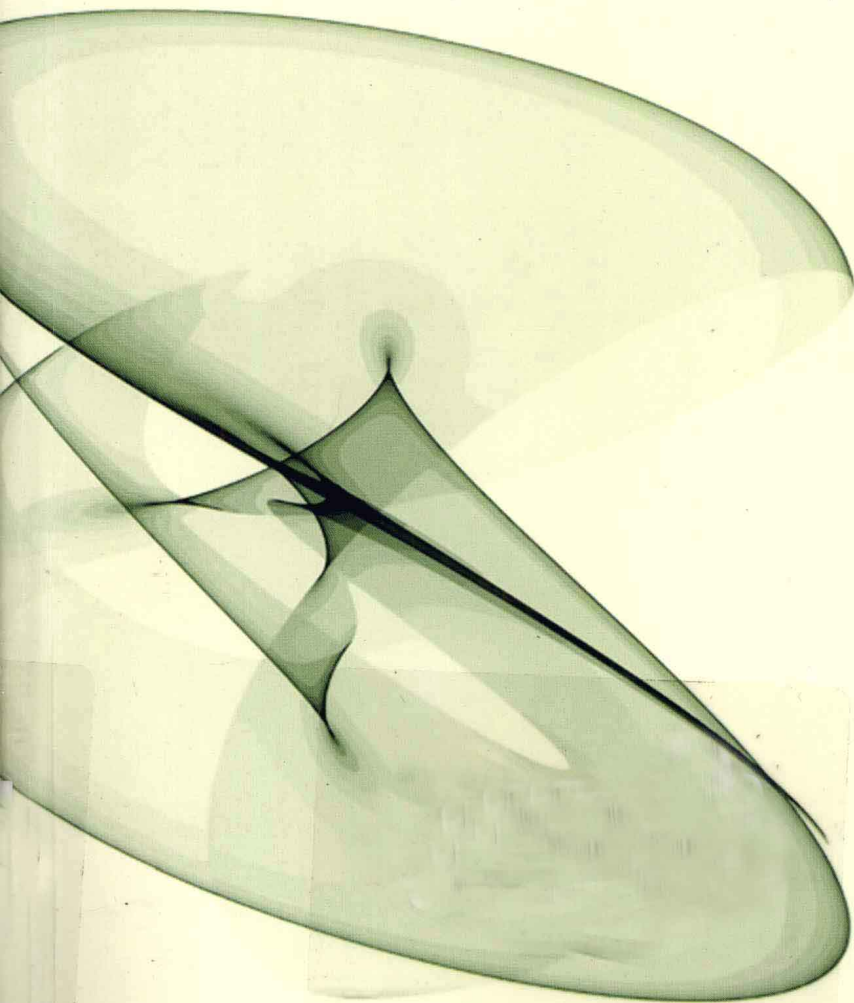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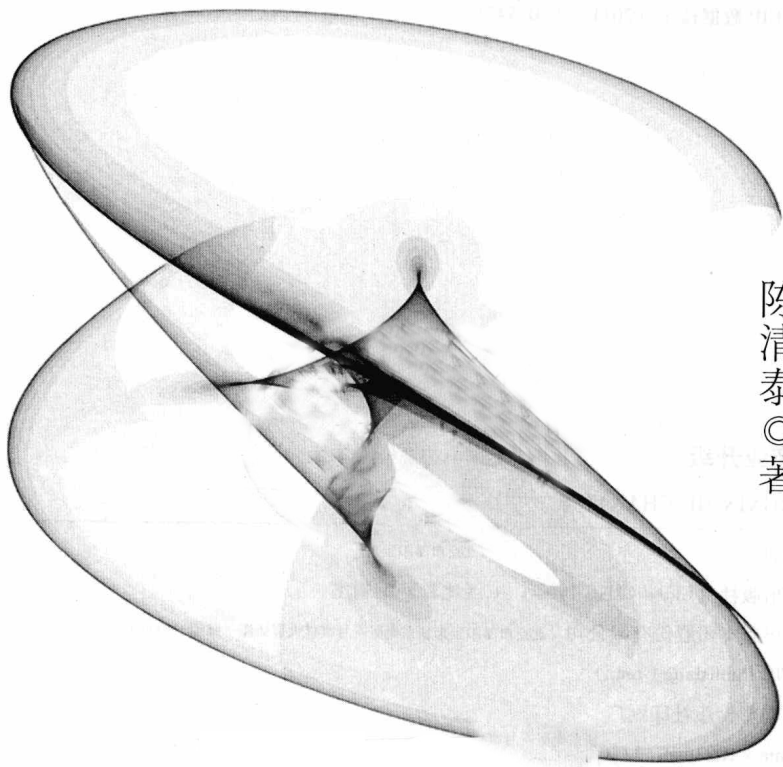
陈清泰◎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陈清泰◎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 陈清泰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86-2772-4

I. 自… II. 陈… III. ①技术革新—研究—中国②产业结构—研究—中国

IV. ①F124.3②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474 号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ZIZHU CHUANGXIN HE CHANYE SHENGJI

著 者: 陈清泰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772-4/F·231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总 序

作为 CIDEG 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 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 2005 年 9 月的 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界。我们希望把 CIDEG 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 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及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

习和协调。

在 2005 年 9 月 28 日 CIDEG 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 28 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 CIDEG 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刚刚发布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 CIDEG 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 and 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 SARS、疟疾、艾滋病等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

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国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作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 CIDEG 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 CIDEG 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 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

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 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

青木昌彦

吴敬琏

2006 年 4 月 10 日

序 言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关键。然而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只有解决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深化企业改革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由口号变成现实。本书作者陈清泰同志既曾长期担任企业主管，又有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经验，还有多年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素养，所以他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分析总能贴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引起多方有识之士的共鸣，让企业家、创新者受到鼓舞，使决策者认识到责任。最近几年，我和清泰同志一起就如何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研，走访了许多地方，调查了许多企业。他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的这些意见有时并不“中听”，但切中时弊，发人思考。现在他选择其中若干重要篇章集结出版。我相信读者一定能够得到许多启发。

我国党政领导早在1981年就已提出，要“围绕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从1995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式列入“九五”规划（1996~2000年）到现在，也已经长达15年了。但是三个“五年规划”实施的效果并不如人意，以至到“十一五”和“十二五”之交党政领导人大声疾呼，经济发展转型已经“刻不容缓”。问题出在哪里？看来症结就在于制度和机制存在缺陷。清泰同志在书中对经济转型需要建立的制度和环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建立有效竞争的市

市场环境。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形成转变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使自主创新成为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普遍选择。在目前我国市场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国家行政机构多方控制和掣肘的情况下，影响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体制性障碍是长期形成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是在体制转型尚未完成和产业发展的赶超时期形成的，它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特点，也正是投资和出口驱动发展模式的体制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整体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向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市场价格变动引导企业、企业主导技术进步和创造价值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使我国能够顺利地突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社会。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从 18 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西欧发达国家启动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到 19 世纪末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就进入了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推动增长的新阶段。经济史家对现代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表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之所以能得到广泛运用，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制度化，即一些国家率先建立起有利于科学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整套制度，支持了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发明家的大胆实验、企业家的创新创业，使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业进步，三者相互推动，进入了良性循环，其中，大学成为培养人才、创造知识财富的主要基地，而追求利润的企业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力量。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制约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的障碍仍然严重存在。在发达国家，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跨国大企业集团必须持续实现技术创新的产业化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却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但在当下的中国，一些国有大企业集团并没有积极创新的压力，而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还很不理想，其创新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很好发

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如何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方面一直做得不够好，容易出现极端化倾向：要么简单否定技术引进的作用，要么容易患上对外技术依赖症，丧失自主创新的意志和努力。此外，政府在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也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清泰同志从企业、产业和政府多个维度出发分析影响我国现阶段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提出了许多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政策思路；例如，要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最大的决心持之以恒地培育本土的技术能力；要确立科技型创新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要正确处理引进外资与发展本土企业的关系；要创造有利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最重要的是推进传统管理体制的改革，扫除阻碍企业创新活动展开的各种体制、政策和环境因素；要有创新的决心、信心和宽容心，培育创新精神，提升民族自信，等等。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政府、企业界和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反应。

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不同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还是按照过去追求投资规模和定位于低端制造的路子，还是坚持政府直接插手，由各级政府部门制定技术路线、确定产业发展门类，甚至直接选择投资项目等，这种“产业升级”的结果就必然造成产业同构化和投资失误。政府应该做的是致力于创造环境，支持企业靠自己的拼搏，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形成产业链完整、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本书针对一些地方以发展战略化新兴产业之名，大搞圈地、圈钱的做法提出了警告，认为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只能是“引来了企业，见不到技术”，必须防止把发展新兴产业演变成“升级版”的外延扩张和启动新一轮“两头在外”的产业链低端制造。

目前有一种议论，就是认为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有了很大好转，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位曾经的国企改革的直接参与和推动者，清泰同志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过程的曲折和甘苦有深切的体会。他对近年来国有经济改革在认识上出现的反复和改革整体形势的起伏感

到担心。他担心改革的停滞和反复，最终会影响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影响我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正如清泰同志在本书中指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国有经济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深化改革，应当坚持已经确立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完成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使国家从拥有国有企业，转变为拥有国有资本；从管理国有企业，转变为通过受托机构专业化运作国有资本；推动大型国企的二次改制，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尤为重要的是，要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系统全面地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为我国现代化大业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

阅读此书，让我重温我和清泰同志这些年来到各地调研了解到许多前沿性创新时的激动之情，以及对许多创新受到压抑的遗憾。我相信读者必定也能从本书的字里行阅读出作者呼吁构建一个激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的急迫之意。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不断提升的产业技术能力，凸显了我国产业界蕴含的巨大创新潜力。目前我国产业技术升级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时刻。如果我们能够推进和深化改革，创造一个有效支持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我国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得到发挥，我国产业技术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以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将是可以预期的。

历史的机遇再次来临，要加紧努力啊！

是为序。

吴敬琏

二零一一年四月廿九日

导 言

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之后，实体经济在快速增长之下掩盖的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从2008年底开始，我和吴敬琏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世楫博士、张永伟博士和王青博士等一起，就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影响、挑战和机会进行跟踪调研。目的是从思路和政策层面为政府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调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产业结构升级与自主创新和企业改革密切相关，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载体。这就使我们的调研扩展到相关领域。吴敬琏教授的指导和参与，提高了调研工作的水平，使调研工作既深入实际，又有一定的高度。调研中，从政府官员、企业家、研发人员、金融机构、专家学者和同行的政策研究人员那里，使我了解了很多情况，学到了很多知识，在讨论中使我受到很多启发。在一些人的鼓励下，我结合过去的积累，写成了这本书。如果说这里有一些新意的话，很多思想火花来自于和大家的交流、讨论及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

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10月在山东考察时说：“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工夫，坚决打好转变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接着，2010年2月，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时，胡锦涛指出：“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国家高层领导对目前状况的忧虑和推进转变发展方式的急切心情。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规划建议，就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

变”之一。但是，一路走来，在很多地方似乎总有一种“方向灯向左打，方向盘总向右跑偏”的感觉。

转变增长方式如此之艰难，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如此之好，为什么不能继续干下去？有什么必要“非转不可”呢？岂不知，发展中国家由落后走向先进的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条件不同、社会需求不同、主要矛盾不同，增长方式只有适时调整，才能获得稳定发展。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在经济起步、解决温饱的阶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客观地讲，依靠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把我国带进了人均 GDP 超过 3 000 美元的水平。但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终将耗尽。一方面，这种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能量已明显减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使我们“四顾不暇”。勉强按这种增长方式走下去，不仅会使我们在“投资依赖的经济增长陷阱”中越陷越深，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支持我们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尤为重要的是，粗放增长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矛盾，很可能使我们无法承受，最终酿成恶果。我们必须从前苏联“变色”和拉美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历中，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对转变增长方式的形势进行再认识，对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的讨论，显得十分必要。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要实现技术来源由引进为主，转向在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并在一些领域挑战世界先进水平；为制造业由资源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并以新的技术成果创造新的产品、构筑新的产业链、塑造新的产业创造条件；以新技术的突破，大幅度降低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化解长期困扰我们的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是实质性提高国家竞争力必须跨过的关键一步。

但是，对要不要、有没有能力自主创新，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争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争论会使人犹豫，不及时加以澄清就会成为前进的障碍。争

论主要是对形势的判断。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已经到了以创新求发展的阶段？中国现在还处于技术跟踪的阶段，能把引进的技术消化好已经不容易了，哪有能力挑战先进技术？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些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就是近年我国的技术创新要素日渐增强。例如，引进技术的示范效应开始发酵，较快增长的科技投入开始结果，创新活动逐渐活跃，产业配套能力大幅度提高，技术对外依存度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研发人才队伍迅速扩大、智力型劳动力后备充裕，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政策环境不断改善。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倒是外国官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更加敏感。2010年1月6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房总务课长助理的一篇题为“要尽快与科学大国中国合作”的文章。文章列举了超级计算机、载人太空飞行、再生医疗、超导技术等“大量举世瞩目的科学成果”，认为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了中国科技的现状”。凭他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三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2010年12月7日，英国路透社一篇“中国领先美国七大技术”为题的文章透露，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说，中国在高速铁路、超高压交直流输电、先进的煤燃烧技术、第四代核电、超级计算机等技术上的成功，代表着美国的又一个“卫星时刻”（指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朝野产生的刺激）。奥巴马2011年1月27日在国情咨文的一个小时演讲中，四次提到中国，称中国在教育及科技等领域潜力巨大，“美国应把中国当做榜样”。他还说：“中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快速的计算机，还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基地。”在2009年出版的《论中国信息化技术产业发展》一书中，江泽民写道：“许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跨越的潜力，而是缺乏创新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缺乏必胜的信心”。^①这段话不但很准确地描述了我国现行通信产业的发展状况，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产业和技术发展的现状。

① 江泽民，《论中国信息化技术产业发展》，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根据调研中看到、听到的情况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的基本条件已经形成，创新要素迅速成长，技术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已经到来，一些技术领域已经到了突破的临界点。但是管理体制改革跟进滞后，不能支持我们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我国现行的体制比较适宜技术引进、模仿、跟踪，还不太支持自主创新。创新的环境条件、相关政策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适应。只有在实践中进一步理清思路、改革不适应的体制、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把蕴含的创新能量充分释放。

2008年迅速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我国产业在快速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充分暴露，而且也形成了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动力。

一方面，传统产业领域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投资，在产业链低端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大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况，投资扩张的空间逐渐消失，很难再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实际上，我国传统产业已经进入了从低端制造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延伸为特征的调整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强大的力量催生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绿色、节能、环保为特征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各国争夺危机后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新兴产业处于起步阶，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尚未形成，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为我国的技术赶超提供了机会，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广阔空间。

为抓住机会实现结构升级，把保增长与调结构、促转型有机结合，国务院迅速发布了产业振兴规划，推进传统产业的调整、改造和升级。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加速技术追赶的进程，力争在某些重要领域实现跨越。把多年以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的诉求，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兴产业而变为现实。

各个地方和企业都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到这一艰难的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但是，必须承认，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以致政府和企业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中，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例如，有人说，中国产业升级还远着呢，“给外国人打工至少

还得30年”。有人认为，新兴产业有很大风险，不如等外国人技术上过了关我们再跟进。有的企业为获得政策优惠，以引进的技术、关键零部件拼凑出“创新产品”，美其名曰以“技术集成”的办法发展新兴产业。一些地方以发展新兴产业为名，圈地搞开发区，推行升级版的“三来一补”式的投资扩张。有的地方以政府立项、确定目标、设立门槛、认定依托企业、进行项目审批，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抓今天的产业升级。

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在经济转型的这个时点，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与全球产业革命的机会相汇合；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国内强大的产业化能力相叠加，就在我国形成了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最有利的形势。

以这次产业振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标志，我国工业化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标志性的要点是：

◆ 由增长速度导向，转向以增长的质量效益为目标，使我国产业由做大转向做强；

◆ 技术来源由引进模仿为主，转向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为主，逐渐实现技术自立，在某些领域向技术领先进军；

◆ 由大规模低端制造，转向在产业链上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延伸，实现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

◆ 由产业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和新的产业链；

◆ 由国际分工中的依附地位，转向突破核心技术，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进而在某些领域开始挑战跨国企业的产业领先地位。

机会比什么都珍贵，但也稍纵即逝。如何以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胆识抓住发展机遇，以应有的自信判断当前产业升级的形势；应当怎样理解和认识这次结构升级，企业如何及时调整战略，勇于迎接新挑战、利用新机遇；政府如何以新的理念创新管理方式，迎接这一迅速发展的形势，都需在实践中进一步理清。

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发展新兴产业，都是技术进步条件下，市场作

用和企业决策的结果。如果企业对技术进步缺乏应有的敏感、对市场趋势没有正常的反应，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转变增长方式最终取决于企业。所以，进一步加强市场主体建设对我国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国有企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它们的举止对经济的整体绩效举足轻重。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由传统体制下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转向公司化的制度创新；大力度推进“抓大放小”、减人增效、关闭破产、企业重组；通过债转股、三年脱困等政策措施推进结构调整，焕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国有经济向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重要制造业集中，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支撑了进入新世纪后国民经济的十年产业繁荣。但是，政企不分的弊端，事实上对非公经济的排斥，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获得垄断权力的国有企业，很难克服因体制机制缺陷而带来的经营机制和创新活力方面的劣势。在我国经济整体上需要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这些弊端和劣势将更加明显。

经营性国有资本是传统体制留下来的一笔巨大财产。如果运作得好，在推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保障社会公平、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能否继续发挥、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有资本布局能否不断优化，二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能否进一步深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是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国有资本是市场经济下政府掌控的特殊稀缺资源，它的活力在于随形势变化可以动态地灵活进退的“可流动性”。企业，包括有国有资本投资的企业则要稳定地强化主业、潜心培植核心竞争力，做强做大。国有资本要进入非公资本不愿或无力进入的领域，实现政府的公共目标、社会的整体福利；而企业则应以营利为目标，提高投资回报。可以看出，国有资本的进退和企业的做强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企业制度创新的政策意义，就是通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对“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解放“两个自由度”：国家拥有国有资本，委托专业化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不断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实现公共目标，并不偏爱某个企业；企